



孙·文·武·传

1886—1975

董必武传

(1886—1975)

下

《董必武传》撰写组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董必武传：1886～1975 / 《董必武传》撰写组.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
ISBN 7-5073-2010-3

I . 董… II . 董… III . 董必武 (1886～1975) - 传记
IV .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430 号

董必武传 (1886—1975)

著 者/《董必武传》撰写组

责任编辑/边彦军 吴少京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680×960mm 16 开 68.75 印张 795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套

ISBN 7-5073-2010-3 定价：100.00 元（上、下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	童年	(1)
二、	初露才华，考中秀才	(7)
三、	“恨官府”、“仇洋人”	(12)
四、	文普通学堂的高才生	(18)
五、	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	(23)
六、	投身辛亥革命	(33)
七、	从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	(43)
八、	参加策动反袁称帝的斗争	(52)
九、	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63)
十、	举办新型学校	(80)
十一、	组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91)
十二、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1)
十三、	一次争取军队的尝试	(113)
十四、	播撒革命火种	(119)
十五、	组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	(125)
十六、	掀起湖北反帝斗争新高潮	(137)
十七、	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47)
十八、	策应北伐战争	(162)
十九、	掀起湖北农民运动高潮	(179)
二十、	“不要理他，我们照样登！”	(194)
二十一、	反英斗争的重大胜利	(200)
二十二、	痛击蒋介石篡权阴谋	(205)

二十三、声讨蒋介石	(224)
二十四、沧海横流显本色	(236)
二十五、在白色恐怖下	(248)
二十六、莫斯科学习岁月	(259)
二十七、在中央苏区	(265)
二十八、长征路上	(272)
二十九、抵达陕北之后	(288)
三十、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武汉	(296)
三十一、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	(309)
三十二、恢复、发展中共湖北党组织	(316)
三十三、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324)
三十四、为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	(332)
三十五、国民参政会上的团结与斗争	(339)
三十六、在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	(347)
三十七、推动国统区宪政运动	(354)
三十八、关心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	(360)
三十九、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	(371)
四十、广交朋友 团结大多数	(381)
四十一、南方局整风	(392)
四十二、在反对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	(400)
四十三、痛斥何应钦	(405)
四十四、祝寿	(414)
四十五、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奔忙	(421)
四十六、同国民党重开谈判	(426)
四十七、与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共商改组政府	(443)
四十八、出席创建联合国大会	(448)
四十九、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460)

五十、 勉励华侨发扬爱国精神	(470)
五十一、 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	(476)
五十二、 赶赴中原解放区，解决燃眉之急	(490)
五十三、 揭露美蒋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	(495)
五十四、 解放区救济总会主任	(509)
五十五、 发展、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521)
五十六、 推动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开辟第二战场	(529)
五十七、“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541)
五十八、 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553)
五十九、 在晋察冀财经会议上讲话	(569)
六十、 统一华北解放区兵工生产、交通运输和 金融贸易	(578)
六十一、 当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594)
六十二、 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创立人民民主法制	(606)
六十三、 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踊跃支援前线	(615)
六十四、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	(619)
六十五、 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	(623)
六十六、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上)	(631)
六十七、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下)	(644)
六十八、 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日子里	(660)
六十九、“统一战线仍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668)
七十、 团结党外人士一道工作	(676)
七十一、 扑灭察北鼠疫，同灾荒作斗争	(685)
七十二、 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	(698)
七十三、 代理政务院总理	(706)
七十四、 为新中国政权建设呕心沥血	(718)
七十五、 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基	(738)

七十六、训练和培养政法干部	(748)
七十七、华北县长会议	(762)
七十八、一封关于政权建设的建议信	(775)
七十九、司法改革	(782)
八十、加强经济建设中的政法工作	(796)
八十一、促进法学科学的发展	(807)
八十二、“国家和人民需要检察机关”	(816)
八十三、倡导“按法律办事”，培育守法思想	(823)
八十四、迎接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835)
八十五、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	(847)
八十六、贯彻实施人民法院组织法，建立各项 审判制度	(861)
八十七、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改善审判作风	(872)
八十八、总结审判经验，提高审判质量	(878)
八十九、肃反斗争中的审判工作	(887)
九十、致力民族团结	(903)
九十一、在“八大”提出“依法办事”	(914)
九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发表前后	(929)
九十三、在反右派运动的日子里	(942)
九十四、抵制“左”倾思潮	(953)
九十五、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	(962)
九十六、参与主持全国政协工作	(983)
九十七、当选国家副主席	(993)
九十八、“庐山面目真难识”	(1003)
九十九、“跑龙套也要认真”	(1013)
一〇〇、植树造林，造福子孙(上)	(1025)

一〇一、植树造林，造福子孙(下)	(1041)
一〇二、八旬老人的抗争	(1051)
一〇三、“午后云开红日升”	(1060)
一〇四、协助打开外交新局面	(1065)
一〇五、深信前途会伐柯	(1073)
后 记	(1084)

五十七、“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一九四七年初，解放战争继续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在坚持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又故意渲染和谈空气，以寻找一段喘息时间。一月十六日，司徒雷登将国民政府派张治中赴延安，以求重开和谈的设计，正式通知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当时董必武正在上海，南京办事处的工作由王炳南负责。王炳南立即赶到上海向董必武作了详细汇报。董必武于当日急电中共中央请示。中共中央慎重考虑后，于第二天（一月十七日）即复电董必武，指出：根据目前形势，蒋介石提出恢复和谈，只是有利于蒋介石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因此，不能恢复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我们应使这种苦难性的和谈恢复不成。答复司徒雷登仍坚持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和取消蒋宪。如他们同意，先由董必武洽谈，张不要来延安。复电中还指示说，周恩来评马歇尔声明已发表，望本此向民盟及第三方面多做解释。

为使更多的人认识国民党恢复和谈的阴谋，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王炳南、叶剑英、徐冰、吴玉章、刘晓、钱瑛、方方、林平、潘汉年、章汉夫等，进一步明确提出对美蒋和谈真相的宣传工作应坚持两条主张，要理直气壮地向各方

面做广泛解释，说服民盟、民革、民进及民建与一般朋友，了解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及取消伪宪政这两条为最低限度要求，使他们不但敢于同我们作同一主张，而且敢于进一步揭露美蒋和谈的欺骗性，坚持向美蒋斗争，坚信人民胜利前途。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又致电董必武、王炳南，指示董必武暂驻上海，不要回南京。王炳南对美蒋应持冷淡态度，要求美蒋方面接受中共提出的恢复和谈的两项条件，否则不能开谈。

面对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又玩弄和谈阴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两条原则的严正立场，美国政府感到很难办，遂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宣布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这不仅宣布了美国“调停”的失败，也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是要支持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二月六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美大使司徒雷登本日通知中国政府及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谓美国政府将协助受委托之中共人员，返回可能通行之共党区域，并协助国民党政府执行小组人员，返回原来之站头，直至三月五日为止。这就是美蒋共同谋划而先由美国大使馆放出逼迫中共驻国统区机关自动撤退的信号。这表明美国决心支持蒋介石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特务也加紧了对我党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等地公开机关的限制和监视。中共中央洞察美蒋阴谋，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斗争。在美国政府宣布撤出三人小组和军调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国统区各地党的负责人，指出：（一）美方撤出三人小组，表示美方最后破坏停战协定。我方不再受其约束，但仍愿为一月停战协定而奋斗。（二）美方撤出军调部，表示美方已公开退出军调部。我方主张中国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应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三）要求美军退出在华一切海陆空及军事训练机构。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言

人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胁迫我驻京、沪、渝三地联络处工作人员自动撤离事发表声明，指出：“京、沪、渝三地中共联络处之设立与存在，以前为国美两方所请及国方许可。其任务为与中外各方联络，除非国方决心从此以后不再谈判，正式通知中共撤销此等机关，或中共方面自行决定撤回，则无取消之理由。若国方既无正式通知中共方面撤退，还要阴谋扣捕中共人员，则一切后果，自应由国方负责。”第二天，中共中央又电告董必武、王炳南：美蒋逼我们自动撤退京、沪、渝机关，“是想从反面说明我们关死谈判之门。因此，我们的方针，坚持保留京、沪、渝机关，表示决不由我方关死谈判大门，但谈判条件，必须实行两条最低要求，断无价钱可讲。你们应本此向第三方面及群众广泛解释”。

当董必武得知确切消息是蒋介石要赶走中共驻京、沪、渝三地联络机构，并下手谕封闭新华社社后，立即于二十五日电报中共中央，并请中共中央立即通知重庆做好准备。中共中央接到董必武电报后，立即于第二天致电董必武、吴玉章等，对美蒋要赶走中共驻京、沪、渝联络机构的问题作出明确指示，指出：一定要坚持非赶不走的方针，并揭穿蒋介石的恐怖手段，以鼓励进步群众和中间人士同蒋斗争的勇气。同时也做最坏的打算。抓紧建立秘密据点，其任务主要做调查研究，必要时跟中央联系。根据形势的突然变化，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于二月二十八日再次致电董必武、钱之光、吴玉章、张友渔、方方、林平等在蒋管区坚持工作的同志，对蒋管区工作的方针和斗争策略作了重要指示，特别要求吴、张在撤退前，尽可能将此意转告隐蔽同志。

蒋介石在逼迫中共人员自动撤离的阴谋失败以后，便迫不及待地于二月二十七日开始下“逐客令”了。二十八日凌晨三

时，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军官送给重庆新华社一个通知，限令《新华日报》自即日起停止出版，所有工作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随即派来军、警、宪、特二千多人，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把报社团团围住，并把报社人员集中，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又包围和搜查了中共驻渝联络处和四川省委机关曾家岩五十号、红岩原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在城内的所有办事地点，并将中共在渝的所有工作人员二百四十九人，其中包括中共代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国民参政员吴玉章，集中软禁在几个地方，搜查了所有的办公室和宿舍，抢走了部分财物，新华社的材料也被“点交代管”。在吴玉章的领导下，二百多人团结一致，坚持斗争。

当天夜晚，南京、上海两地的警备司令部同时通知中共南京办事处、上海联络处，限于三月五日前撤返延安。大约十点半钟的时候，国民党军、警、特立即包围并进入上海联络处，宣读了上海警备司令部致中共办事处的快邮代电，电称：“查该党拒绝和平谈判，制造内战，复在本市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本部为确保治安，兹通知该党在沪人员，限于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所有撤退人员及其眷属限于三月三日前开具名单送部核办。”接着就把联络处工作人员集中在二楼，禁止行动和打电话。这天夜里，董必武正外出会见民主人士，至午夜时分回到办事处时，发觉情况不对，当汽车开至办事处门口刚刚停下，几个便衣特务便气势汹汹地围上来说：你们被监视了。董必武立即提出强烈抗议，并提出要找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交涉，被特务蛮横阻止。董必武非常气愤地斥令特务：闪开！让我们进去。在听取了钱之光等同志的汇报后，董必武强压内心的怒火，从容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但是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就要同他们斗争。目前最重要

的是不能把我党的任何一点机密落在敌人手中。同时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外界知道这里的情况。联络处的同志立即按董必武的布置和要求，清理和销毁文件。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京、沪、渝三地的同志，听到国民党当局下“逐客令”的消息后，立即于当天（二月二十八日）致电董必武、钱之光、伍云甫、王炳南、童小鹏等并转告方方、林平、章汉夫，对京、沪、渝三地中共代表办事机关撤退前的工作及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出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一）顷据蒋方广播，渝、宁两地均已下逐客令，估计上海必跟着来，剩下的解总联络处，为时必不会久。（二）蒋此次逐客，系用地方当局出面，不保护安全的形式。但我们须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办法有五：甲、由周电蒋。乙、董必武、王（炳南）在沪、宁分别以口头或书面询问吴铁城、吴鼎昌或宋子文，国民党及政府是否知道京、渝两地当局此种行动，如知道，则请以正式公文通知中共驻南京代表董必武，我联络机关自当撤退，但必须限期延长。丙、蒋若对以上甲、乙两项不答复，我则向中外公布。丁、动员京沪中外记者质询蒋方人员，逼其答复，以明责任。戊、董必武在撤退前发表谈话，并宣布交涉经过。（三）王炳南立即向美方说明经过，交涉撤退时所需全部飞机。（四）渝方撤退计划已告，凡无法疏散隐蔽者均撤延。一切均请董必武依情况决定。（五）解总人员将来撤退，应要求联总、行总由海路送烟台或其他口岸。

在被国民党包围的第二天早晨，上海办事处的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董必武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首先对形势的发展做了分析和估计，他说：一种可能是国民党政府迫于我方强大和我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不敢对我们下毒手，把我们押送回延安；一种可能是把我们长期软禁，或关进集中营；还有

可能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抓走，分而治之，使我们死活不知。他在讲述应采取的斗争策略和办法时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跟中央取得联系，跟上海的其他同志取得联系，跟友好民主人士取得联系，向外界揭露国民党当局包围、监视我们的暴行，揭穿他们和谈的假面具。让人们都知道最后关闭和谈大门的是国民党。最后，董必武语重心长地向全体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告诉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不要抱任何幻想，他们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的。要做最坏的准备。叮嘱大家要坚持革命气节，宁死不向敌人屈服，不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同敌人斗争到底。大家听了董必武的讲话后，一致表示宁死不屈，准备进行最后的斗争。

三月一日，董必武向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提出书面抗议。之后，董必武到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吴国桢，吴以有事推托不见。董必武又到上海警备司令部找宣铁吾。他气愤地质问宣铁吾：“我们中共代表是你们政府请来谈判的，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严正指出：“剥夺中共人员自由系非法活动。”要求“将包围办事处之军警撤走，以便我们办事人员得以抵挡一切，准备撤退事宜”。“我即将离开上海去南京，联络处和《新华日报》人员也将去京，你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宣铁吾等理屈词穷，只得答应。同一天，董必武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对蒋管区群众运动的方针作出明确指示：“蒋管区群众运动，特别是群众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可能遭受极大压迫。”“为适应这一新变化，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应暂保持平静状态，然后有计划地转移到带地方性经济斗争中去，以深入和巩固群众斗争基础。”接着又接到周恩来自延安打来的电报，让董必武用明码电报转告吴玉章交涉回延安的飞机。如飞机无着，汽车护送必须交涉国

防部护照，以免胡宗南捣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董必武于当晚即同美国驻重庆副领事布德联系，交涉中共留渝人员撤退事宜，并通过布德致电吴玉章，告知中共中央同意撤退留渝人员，并告美蒋派两架飞机护送。

《新华日报》被迫在三月一日停止出版。自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出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被封闭，《新华日报》共发行了九年零四十九天，连同最后一张未印完的报纸，全部运回延安，在全国解放后运到北京，成为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宝贵资料。

同情、支持我们的各界人士、朋友以及新闻记者，听到中共人员要撤退的消息都很关心，纷纷要求与中共代表团见面。黄炎培托人给董必武送来了慰问信。马寅初、柳亚子亲自来到办事处，一定要进来看望董必武。特务开始是千方百计阻拦，经过两位老先生据理力争，严厉斥责后，特务只好打开办事处的大门，让两位老先生进去。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位友好人士，并把办事处遭到无理包围和非法监视的经过告诉了他们，要求他们向舆论界说明事情真相，谴责这种破坏和谈的倒行逆施。马寅初、柳亚子听后十分气愤，表示一定要揭露国民党当局的这一暴行。之后，又有许多人聚集在办事处的门口和周围，其中有许多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内，他们要求采访，同样遭到特务们的拒绝。董必武亲自去交涉也无济于事。于是，董必武就让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陈家康打开窗户，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向围在办事处周围的人们及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抗议国民党当局下令监禁我们，并限期让我们撤离国统区，最后关死和谈大门的行径，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和国民党的本来面目。

三月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就蒋介石强迫中共驻京、沪、

渝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事发表声明，指出：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蒋介石这一荒谬步骤，如不立即改变和放弃，那真是他自己走到了绝路，一切后果由他负责。当天上午十一点，董必武收到王炳南自南京发来的电报，转告中共中央指示办事处人员可于三月七日撤退，要董必武务于三月二日夜由上海返回南京。董必武于下午三时向国民党当局送交了撤退人员名单，并交涉撤退事宜。在离开上海前，董必武再次向宣铁吾提出书面抗议，驳斥了国民党对我党的污蔑，指出：“来件称我党拒绝和平谈判，绝非事实，我党上海、南京、重庆等地联络人员所以迄今未去，正表示为争取和谈之方便。来件中又称在本市煽动风潮组织暴动，更属无稽，不得不表示严正抗议。”要求：“通知卢家湾分局迅将驻守门外、宅内之警局人员全部撤回，以便此间进行撤退事宜。”他随即于当晚十时半偕夫人何莲芝及子女等乘火车赴南京。

三月三日晨七时，董必武一行到达南京。下车后被国民党军警留难一小时，董必武厉声斥责了他们之后，他们才让董必武一行乘坐出租汽车回到办事处。稍事休息后，董必武立即前往访问张治中，询问国民政府有无致中共关于撤除京、沪、渝三地办事处之正式公函，政府是否决心用军事方式解决国共问题。接着他又访问了张群，商谈有关中共人员撤退问题，要求他们保证上述三地中共人员的安全和撤退时的飞机，并严正指出：上海联络处的人员不到南京，不保证重庆中共人员回延安的飞机，我们就不走。最后他又访问了邵力子，看望了司徒雷登，谴责国民党关闭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荒谬行径，要求美国保证我驻京、沪、渝全部人员飞返延安的飞机。回到办

事处后，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名义函复国民党首都卫戍总部：“美方协助之空运工具未能于你部限定之期限内充分利用，须延至本月七日，如气候无故障，敝处留南京人员及眷属，决于七日飞延。”

三月四日，董必武将周恩来致民盟主席张澜，商请民盟代为保管中共在南京、上海、重庆三地财产的电文送交罗隆基。同时，董必武又接到周恩来自延安的来电，告以京沪国特甚注意章伯钧、罗隆基、史良三人，应告他们速布置香港退路。

三月五日上午十一时，董必武在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国民党逼迫中共驻京、沪、渝三地人员撤退发表了重要谈话，并在谈话的最后表示：盼能与诸位重晤于南京。是日，他与王炳南、章文晋到美国驻华大使馆，向司徒雷登及其秘书傅泾波辞行。之后，他又电告吴玉章，国民政府准备四架飞机，七日载渝人员飞延。留两人等昆、蓉人员到渝后，政府另派飞机送郑州转邯郸。办公室财产可交民盟马哲民代为保管。

上海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钱之光、华岗、潘梓年、陈家康、刘昂等十三人亦于三月五日乘火车到达南京梅园。

三月六日，一切撤退工作都准备好了。董必武利用从美军借来的大电台，向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发了最后一个电报，汇报了撤退的准备工作和全部人员名单，以及几天来各方人士的反应；告知京、沪、渝三地人员明日飞回延安，将有七架或八九架飞机降延安机场，请中央早做准备。之后，董必武出席了中国民主同盟在南京的负责人罗隆基专为中共人员返延饯行的午宴，对民主同盟慨然答允保管各地财产，表示感谢。为了使南京各界人士及时了解我们撤退的真相，发表了经董必武审批的中共南京、上海工作人员的《告别启事》：“自去年十一月和谈断绝，中共代表才不得已返延之后，虽战火日炽，环境益艰，